

CHOUSHADEQISHI
BASHINIANDAI
ZHONGGUOQIYEJIA
BEIHAIJISHI

仇杀的启示

八十年代中国企业家被害纪实

荒原 著

仇杀的启示

——八十年代中国企业家被害纪实

荒 原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仇杀的启示
——八十年代中国企业家被害纪实
荒 原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市北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14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

ISBN 7-5059-1333-6/I·948 定价：2.60元

荒原（王滨）自号辽南山人。1957年闻新年钟声而急于脱胎，2日大连明泽湖畔便多了声无邪啼哭。童年于辽南乡下望浮云流走而入梦境，少年因岁月动乱而心如荒原。18岁大潮所挟而由瓦房店镇去老帽山下修梯田，21岁推开吉林大学校门投拜缪斯膝下。25岁返回尘世供职于辽宁省地质局。26岁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杂文、文艺评论等，现为作协辽宁分会会员、沈阳市作协理事、作家生活报总编助理兼编辑部主任。本书系作者第二部著作单行本。

目 录

序 章	并非非说不可的话	1
第一章	仇杀的启示	5
	“脊梁”的隐痛	5
	对一桩杀人案过程的叙述	8
	在过程的背后	14
第二章	总经理何以被杀?	21
	王淑琴被害真相	22
	枪决后的余音	30
	人情的重要	47
第三章	“草民”操戈	59
	悲剧——偶然? 必然?	59
	山城血案之端倪	62
	人格觉醒与逆反情绪	68
	“草民”意识及其翻版	73
	来自“刁民”的威胁	77
第四章	复杂的厂长阶层	85
	一个寓言与一堆未展开的故事	85
	险境中的经营者	94
	租赁承包: 工人买账不买账?	106

第五章	主与仆的龃龉	113
	优化组合带来的“伙并”	113
	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么?	127
	分配不公不是全部理由	135
	受冷遇的工会	142
第六章	企业灵魂的复归	146
	辽南有这样一位厂长	147
	隐形的“政治”	151
	“权威”的真谛	158
后 记		169

序 章

并非非说不可的话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曲折折地走过了三十个年头的时候，亚洲大陆上这个人口最多、包袱也最沉重的民族开始背水一战——改革寄寓着这个民族最为强烈的更生希望。整个人类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这场变革的，“逼上梁山”的故事永远意味着被动和不得已。然而，这个占地球总人口五分之一的老大民族在即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信号面前难道还有第二种选择吗？

于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的炎黄子孙在为他们所信赖的领袖们带领下开始下水——“摸石头过河”了，尽管他们并没有测量清楚前面的水有多深，甚或还不知道那水究竟是可以摸石而过的河，还是摸石头不足以过而要武装泅渡的一片汪洋大海。

冒险，这个曾经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视为教训的字眼，在今天新的更为严峻的形势面前远不如“保守”更值得警

减。为生存而竞争的意识使得冒险精神具备了伟岸光耀的品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又一次证实了它在中国大地上的可行性与实用性，从而十分必要地坚定了改革者的信心。生来就注重实惠的八亿农民异常欣喜地看见对温饱小康的期待已经或正在变成现实，因而也就诚心拥护这场大变革向更深一个层次推进。于是始料不及的问题便伴随改革的深入而必然地出现了，通货膨胀工资物价官倒走私偷税行贿失业倒闭童工等等社会疾患在政体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坦率地告诉国民：改革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

环境越是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强烈——西方史学界这一著名观点吻合了今天的中国。这一观点也正在中国被重新证实。

对于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来说，困难决不会成为危机。这个民族一向不乏信心。

欲望膨胀之时，便是与历史对立之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是如此。与历史对立起来，去寻找更新的路径，这本身无疑是痛苦而艰难的，无奈谁也不能使得民族振兴的欲望不膨胀起来。

历史要前进，民族要前进，这是无法变更的法则。遇到什么困难，便去解决什么困难，这也是法则。然而还不够，还应当去省识，去觉悟，去寻找今后不再遇到此类困难的路径。这怕是法则的法则了。

正是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我操起了《王淑琴现象》这个题目。

“王淑琴现象”就是企业负责人被残杀被伤害现象。这

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里出现的引人注目的奇特现象。

“王淑琴现象”的普遍意义及其与社会大变革的关系，决定了它在中国新时期改革过程中以及整个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页悲剧性的记载。

为此我决定写一篇较长篇幅的文章，以便记录和研究当今中国大陆上的企业领导人何以屡屡被杀被伤害，分析这一现象赖以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社会影响及其发展的趋向。有造诣的文学家把这类文章划归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之列。我要写这篇纪实文学的动机完全是积极的——尽管涉及这类题材对我来说很有风险。我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我对所冒的风险十分清楚。

许多在企业里工作的朋友闲来便要发些牢骚，无论当厂长经理的还是当工人的。在我的感觉中，他们掷给我的是一捆捆干柴，一堆点火就着的干柴。这使我十分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只是没有想到，最先到来的竟然是杀害企业家！是淋漓鲜血！

事实上我产生写《王淑琴现象》的最初念头是在1988年7月底，那时候满沈阳城都在议论人民旅社总经理王淑琴被她属下的一名青年工人杀害的事情，而且——无庸讳言，多种渠道传来的“真实”消息所披露的事实与见诸报端的官样文字相去甚远——无论内容出入还是详尽程度上都是如此。我之所以披浴满城风雨去市公安局和省高级法院的朋友那里了解这起事件的真相，最初完全是我天性的好奇以及某种道义感使然。

不久，一条炸弹一样的信息将我掀入了思考的深渊——

1988年8月。大连。心事沉重的公安局长们参加了省厅紧急召集的以如何保护企业家为主题的会议。一份会议材料里介绍了“今年以来全省企事业单位领导同志遭到报复伤害情况”——仅七个月的时间里，辽宁省企事业单位内部就发生威胁、殴打、伤害基层单位领导同志事件276起，其中立为刑事案件、治安事件的105起，有3名“老板”被杀死，31人被打成重伤，遭受殴打而幸免于伤的120人。在被伤害的近300名“老板”中间，有厂长经理196人，车间主任71人，工段长30人。

这才仅仅是一个辽宁省！

辽宁省的城市人口只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问题还不够严重吗？还不值得我们去冷静分析认真思考吗？——或者我还不应该去写一写吗？

第一章

仇杀的启示

“脊梁”的隐痛

真正的企业家是中国的脊梁。

改革把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这些“老板”身上，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厂长经理推进了时代的漩涡中。

他们是些踏踏实实操劳在改革第一线的人，在生产经营的角斗场上日夜拼搏，煞费苦心，还要甘罹风险。他们是些聪明能干的俊杰之才，他们的出人头地是以冒险为代价的——政策的转换可能使他们跌得鼻青脸肿，市场的变幻可能教他们名利两伤。改革中出现的一切困难都要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他们是试纸，是靶子，是探雷器。难怪许多厂长私下里都在慨叹：当企业的头儿难哪！

他们的难处，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他们的权力的副产品——工人的反抗。这是当今最突出的“中国病”中之一症。

两位穿警服的新闻记者曾经把下面这一幕令人炸肺的活剧报告给国民：1987年年底，一个叫阚元军的年轻人以他的压倒多数的选票和一张中专文凭而受聘为吉林省浑江轴承厂锻压车间的承包人。这位年轻有为的小“老板”上任后便大刀阔斧，回报他的却是一封接一封的恐吓信！“你再这样搞，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不久，他家的窗玻璃被砸得粉碎，他的家私被偷，继而恐吓信又换成了递向上司的“检举信”，男女关系经济不清之类最容易玷污人也最不容易说清楚的罪名从天而降，直到折磨得小老板花发早生。一向胆小的阚家老父不时地被充满血腥味的陌生人来信吓得魂不附体，“再让阚元军承包，我们就先杀死你孙子，再杀死你儿子，最后毁了你全家！炸药我们都准备好了！”老人认定大难将至，终于一命呜呼。留下遗言：儿子断不可再去做承包人！坟头野草萋萋，小老板欲诉无言，欲仇无路，真个是惘然茫然。

这类事件可谓屡见不鲜。国人中一向不乏那等专事下黑手的“小人”。当我们的“小老板”在工厂里为生产和经营而绞心谋划的时候，大脑皮层上还要不时地显现令人担忧的“警告”。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然而更残忍的还是下面这则故事——

哈尔滨市香坊区浴池综合总店经理兼党支部书记何香荣，是区里有名的女企业家和优秀共产党员。1987年7月，她带领职工集体租赁了香坊浴池，半年盈利近万元，超定额两倍，她的名字因此上了光荣榜，她的事业光彩熠熠。

也许是她干得太红火了，却没有发觉一颗炸弹就要在她脚下引爆。1988年8月4日下午1点钟，店内职工甄国华找到何香荣说：“咱们旅店部不是要买彩电吗？去我家里看看

吧。”何香荣焉知是计？进了甄家，甄国华立即反锁屋门，从腰间拽出一把剔骨尖刀，咬牙切齿地说：“今天卖电视是假，杀你是真！你不是共产党改革的红人吗？我就要拿你开刀，杀你这个改革家！”

一路走红的女经理总以为世上所有的门都是为欢迎她而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使她仓惶无措。何香荣因心脏病复发昏倒在地，丧心病狂的甄国华极尽损招，大肆暴虐，使一个闻名遐迩的女企业家被他蹂躏残害达五小时之久。强奸施虐之后，甄国华又用刀尖逼着何香荣拍裸体照片，拍照时，这个暴徒还一边狂叫着：“让你这个党支部书记好好光彩光彩！好好光彩光彩！”

这真是骇人听闻！善良人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这会是真实的事情。暴徒与何香荣有什么深仇大恨吗？杀父之仇或基督山式的报复？不，都不是。其实事情并不大，请听罪犯自己说——

“租赁以后，我分的工作不好，奖金总拿末等，办自己的事也不方便。何经理总是批评我。我贪污，她拿我开刀。我就是为了报复。”

披露这件事情的两位公安战线上的记者缀后写道：“我们在吉林、辽宁两省采访的一个月间，几乎天天都能听到象甄国华这样‘就是为了报复’的人和事。犯罪分子的报复手段要么行凶、爆炸杀人，要么投寄匿名信，威胁恫吓，要么纵火烧毁厂房、商店。此外，要挟企业承包人，诈骗钱财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据吉林省公安厅内保处韩同志介绍，1985年以来，吉林省发生杀害厂长、经理，纵火烧毁厂房等严重刑事案件11起，杀死9人，致伤致残24人；发生侵害厂长经

理合法权益事件26例。今年以来，此类案件发案率又有上升。”

承包租赁，优化劳动组合，发生在城市企业中的这些改革措施必然地冲击某些社会成员的利益。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品格在一部分国民那里早已淡然，勤劳仅仅体现在家庭里，而勇敢则表现为动刀杀戮上。历史就是这样开着玩笑——社会把人们“惯”坏了，也是社会又要把他们改造过来。这是不是自作自受？

消极的嘲讽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弄清原委。在那些必然性的后面，是否还有逢凶化吉的可能？

对一桩杀人案过程的叙述

这件事情发生在古城沈阳。谁都知道沈阳在当今中国的分量。在努尔哈赤陵园旁边，在张大帅故府的左右，在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上，有价值的新闻和同样有价值的经验因其“改革试点城市”的地位而层出不穷，如同林立烟囱一般挤满了舆论空间。这是个出经验出荣誉的城市，也是个出恶事怪事爆炸性事故的城市。

在沈阳市北郊，有一片20万人的工厂区，那里有中国航空航天部属下的三家大工厂。

1988年5月25日下午5时许，一个神情异样的大个子青工从新阳机器制造公司大门里冲出来，穿过熙攘的下班人流，在松陵第二小学校附近的马路上追上了一位50多岁干部模样的人——

“操你妈，反正我也没好了。我捅死你！”

随着惨烈的叫声，两支半尺多长的水果刀以很快的频率轮番刺进干部模样人的前胸、腹部、颈部。凶手发疯了，两眼血红，面无人色，手起刀落间挟风裹雨。血在喷涌飞溅，干部模样的人挣扎着，翻滚着，把黑红的血铺染着地面……

一分钟后，杨学利带着滴血的凶器来到现场附近的小学校。大门口的收发室里，四位教工正围住一张桌子在“穷和”，谁也没有注意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给派出所打电话，报案。我杀人了。”门外的大个子青年平静地说。

“什么？”“搬砖”正搬得热乎的老师以为年轻人在开玩笑。

“真的，你们打电话告诉派出所。”年轻人又说。

老师们张大了嘴巴，望着眼前这位“文静”的小伙子，心想，这位精神不是有毛病吧？

“要是不肯马上报案，我就自杀！”杨学利擎起了双刀。那刀上血迹犹存。

颤抖的手指拨动了号盘。

一位胆大些的老师试探着说：“你……把刀给我好吗？”

凶手把刀扔在了地上。

五分钟后，派出所来了位骑自行车的警察，把杨学利带走了。

被害人杨佳顺——新阳机械公司52分厂厂长，男，52岁，卓有成就的“老板”，因失血过多死于抢救过程中。医生在他身上找到21处刀口。

一场震惊全国的杀人案就这样发生了。然而报上并未详

细披露这件命案的真情。当地的报纸只是轻描淡写的几笔“简报”。有头脑的沈阳人都知道，做为党的宣传喉舌的报刊有它的难言之隐，他们不否认从记者到总编辑都是些既有责任感同时又更富于政治敏感的人。因为杨学利事件牵引出一个十分复杂难断的因果过程，牵引出法律、政策、道德、人情是非织绕的忧虑。再聪明的人对此也要慎重从事的。

1988年第9期《共产党员内部版》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写的一篇题为《干群关系紧张导致工人行凶报复》的报导，算是比较详细。据那位撰稿人调查分析，杨学利之杀厂长，既有“远因”，又有“近由”。

杨学利，男，24周岁，是该公司52分厂的普通工人。高中毕业后曾入技校学习，进厂当工人后又考入电大读电子专业。杨学利平素忠厚老实，勤奋好学，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工作努力，还搞过技术革新。种种迹象表明，他是现今中国社会里并不多有的好青年中的一个。1985年4月间，杨学利经车间（即现在的分厂）主任同意，由厂部开介绍信报名参加了公安局招干考试。他的笔试成绩为198.5分，超过录取分数线18.5分，体检与政审也都符合条件，沈阳市公安局决定录取他。信函发到厂部，有关领导却不同意放杨学利走。杨学利去找主管人事的副厂长，回答是：“你在车间表现不怎么样，怎么好放你？”

杨学利听后很吃惊，他不明白厂领导何以会对他落下这般印象？扪心自问，在他21岁的生命历程中似乎还没有谁对他有过“表现不怎么样”的评价。他带着疑问找到了车间主任杨佳顺——就是后来被他刺了21刀的分厂厂长。

“是你跟上面说，我表现不好？”杨学利是个“角色意识”很强的人，在领导面前说话声音也打颤，如同见了皇帝老子。

“不错，鉴定是我做的。”杨佳顺对自己拥有的权力信心十足。

“你凭什么说我表现不好？”杨学利有些恼火，但仍然改不掉他怯懦的本性。

“你平素出勤不好，迟到，早退。”杨佳顺习惯地抱起两臂。

杨学利闷紧一口气，找来了考勤表，证明自己一向遵守劳动纪律。杨佳顺无话可说，却仍旧坚持着不放人。

整整半个月里，杨学利来往奔走于厂部与车间，主管人事的副厂长很会做官，他的答复极富中庸精神：“车间放你，我就放你。”

半个月过去了，当瘦脱了相的杨学利最后一次找到那位只手可遮天的车间主任时，他终于等来了“同意放”的答复。只可惜，“扇子买到手，无奈秋风凉”，公安局招干录取报到的日期已经过了。“明年我可以放你。”杨车间主任这样许愿。谁知明年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他杨主任会不会变卦？

1986年，沈阳警察学校招考学员，杨学利满心欢喜又去找杨佳顺，主任答应过的，这一回可以去报考了吧？

“不行，眼下厂里人手紧，你不能走！”

1987年4月，公司在本系统内招考教师，好学上进的杨学利决定报考。他的执著精神与踏实的学业功底使他满怀信心。当他找到杨佳顺并谈及自己的想法时，怎么也没想到那